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一辑】

扶桑十旬记

（外三种）

杨芾等著 杨早整理

凤凰出版社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一辑】

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

扶桑十旬记

（外三种）

杨芾等著

杨早整理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扶桑十旬记 (外三种) / 杨芾等著 ; 杨早整理. --
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4. 3

(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. 第1辑)

ISBN 978-7-5506-1005-7

I. ①扶… II. ①杨… ②杨… III. ①日记—作品集
—中国—清后期②游记—日本 IV. ①I265.2②K931.3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44757号

- | | |
|--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扶桑十旬记 (外三种) |
| 著 者 | 杨 芾 等著 杨 早 整理 |
| 责 任 编 辑 | 樊 昕 |
| 出 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发行部电话 025-83223462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fhcbs.com |
| 经 销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|
| 照 排 |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9号, 邮编: 225008 |
| 开 本 | 880×1230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5.25 |
| 字 数 | 136千字 |
| 版 次 |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506-1005-7 |
| 定 价 | 22.00元 |
- 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 电话: 0514-85868858)

存史鑑今

袁行霈題



袁行霈先生题辞

音實難知，知實難逢，逢其
知音，千載其一身！
知音——今談新編稀見史料
刊，真有治學知音之感也。

傅璇琮謹書

二〇一二年

傅璇琮先生題辭

殫精竭慮旁搜遠紹
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
料庫

王水照
二〇一三年
一月

王水照先生題辭

功、贈從四位、賜金建設銅柱、藏先生測地器械於其中、序文甚古茂、字似魏碑、足見日人亦以漢文漢字爲貴、到芝園對過、遊婦人博覽會、購券入、婦人用品爲多、

初三日、癸巳、雨、余華裝、欲添置衣履、頗不易、幸有廣東雜貨店數家、寄賣上海履、其價祇加半倍、并售中國麻油、鹹蛋、海味等件、日本商店、四壁不挂對聯、若華商、則大門及牆壁、均有聯語矣、

初四日、甲午、大風、午後一時三刻、地震、比前日稍輕、三時、小雨、到三番町、遊番町商品館、貨物無多、到神樂坂上、遊靜岡館勸業場、比番町爲強、晚間鐘聲、開窗東望、知係本鄉區失火、

初五日、乙未、晴、今日中國端陽節也、客中度節、頗動鄉心、到神田區買書籍、日本書肆、以神田爲最多、如紙張稍舊、或微有污損、即比新書賤至一半、如已有增補出版之書、則舊版價目、不過一二成耳、書店半係婦人經理、無論

九月戊子

十月己丑
十七日庚寅

不書

補昨日日記 居此情頗難堪然各移量之信

天馬行空不施羈絆字之境界沿之臻此境者明

之董文敏奉朝之成親王也 肖垣南後街郎官巷

聚成堂來函 字須講結構行氣貫注萬字如字萬紙

如一紙方是不然如土偶木龍終乏生趣胸中不快之至衡育

又呈一稟為奪戲班真是無理取鬧

倡誕生切音捷訣令以音韻之六一快事也

莆令袁唐兩泰成均未歸上同要緊百姓不要緊自古如

出一轍思之一太息 市中 能燈又出有司亦不禁也

西亭來因與果味之山集其寓曰劍妓破
洋一元角歸時已夜分矣杜集來之丁巳
正客後正蘭博處之見洋元有步此
等應酬不日不尔也亦十七元今三元均散去
下層陰又將大水滄入堂室矣壬午
茶餘味之邀去侍青闕賞午醉後
至下街步行上小金山乘大鴨船去一元
仍此味之之侍青闕至夜深始歸
憤々中端午又去壬午今日故我今去

《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》总序

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,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“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”(罗素《中国问题》)。她绵延不绝、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?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:“和平、和谐、包容、开明、革新、开放,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。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,文明就繁荣发展,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,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。”(《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07年第1期)

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,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,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,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,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。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,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,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;更不用说遭逢“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”、“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”(李鸿章《筹议海防折》)、“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”(陈寅恪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序》)的中国近现代。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,但是,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,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。1998年6月17日,美国三位前总统(布什、卡特、福特)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、前财政部长、前国防部长、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:“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。”(徐中约著《中国近代史》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,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)即便如此,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,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,相反,

2 扶桑十旬记(外三种)

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。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,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层面,人们还在不断探索。这个问题,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。但我们坚信,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,涅槃重生。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,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。

不过,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,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。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,内容复杂,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,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,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。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:“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,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。”那么,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,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——这是我们编纂这套《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》的初衷。

书名中的“近现代”,主要指 1840—1949 年这一时段,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,可以适当向前延展,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“近代中国”、“晚期中华帝国”又有所区分。将近现代连为一体,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,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,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,风从何处来;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,或为涟漪,或为浪涛。个人的生活记录,与大历史相比,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。变局中的个体,经历的可能是渐变。《丛刊》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,以个体陈述的方式,从生活、文化、风习、人情等多个层面,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。书名中的“稀见”,只是相对而言。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,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,真身虽仍“稀见”,化身却成为“可见”。但是,高昂的定价、难辨的字迹、未经标点的文

本,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。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,或流传较少,或未被整合,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。因此,《丛刊》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,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、断句费力、哀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,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,在我们看来,这些文献都可属于“稀见”。

书名中的“史料”,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,举凡日记、书信、奏牍、笔记、诗文集、诗话、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,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、思想、性情的文献,都在考虑之列。我们的目的,是想以切实的工作,促进处于秘藏、边缘、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,通过一辑、二辑、三辑……这样的累积性整理,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,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,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,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,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、日常与细节;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,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;甚至在主流中,还有漩涡,在边缘,还有静止之水。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、大痛苦的时代,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、所思所想的起落,藉纸墨得以留存,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。此中有文学、文化、生活;也时有动乱、战争、革命。我们整理史料,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,或者一种贴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。当然,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,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,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,减少因个人视角、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。

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,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。清人舒位诗云“名士十年无赖贼”(《金谷园故址》),我们警惕袖手空谈,傲慢指点江山;鲁迅先生诗云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(《自题小像》),我们愿意埋头苦干,逐步趋近理想。我们没有奢望这套《丛刊》产生宏大的效果,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,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,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,适当“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”

(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版序言)。

《丛刊》的编纂,得到了诸多前辈、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。袁行霈先生、傅璇琮先生、王水照先生题辞勸勉,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,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,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“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”重大规划项目,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……这些,都增添了我們做好这套《丛刊》的信心。必须一提的是,《丛刊》原拟主编四人(张剑、张晖、徐雁平、彭国忠),每位主编负责一辑,周而复始,滚动发展,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,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,令人抱恨终天,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。

《丛刊》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(鼓励必要的校释),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、更好地服务社会。希望我们的工作,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。

2013年4月15日

“文明国”游记

——1903—1907 年中国官绅眼中的日本

一

晚清官绅游历日本者，为数颇夥。现存最早的或是广东人罗森的《日本日记》(1854)，目击美国“黑船”逼迫日本开国的过程。第一位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则于 1877 年赴日，著有《使东述略》，算是第一份亲历日本的官方记录。跟着何如璋赴日的参赞黄遵宪，以十年工夫撰述出版《日本国志》，计四十卷，五十余万字，对日本历史记述颇详，用意却在为中华借镜。1879 年，知名文士王韬访日四阅月，撰《扶桑游记》，王韬此前曾游泰西，其观感比较，又自不同。其后旅日人士撰述，尚有李筱圃《日本纪游》(1880)、傅云龙《游历日本余记》(1887)、黄庆澄《东游日记》(1893)等^①。

总的来说，甲午之前，中国人游日的记录中，对铁路等“文明事物”，无不惊叹，如“大阪距神户六十里，铁道火轮四刻即至。烟云竹树，过眼如飞”(何如璋)，“计程七十里，行半个时辰……车过时骤然视之，面目模胡，不辨老少”(李筱圃)，傅云龙作《日本车表》，交代铁

^① 李、傅、黄三人记述，曾与罗森《日本日记》、何如璋《使东述略》，合编为《早期日本游记五种》(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83)。

2 扶桑十旬记(外三种)

路通到了神户、长崎,黄庆澄则看到“日本铁路由东京起,东北达青森湾,西达神户”。铁路变利交通,有益国运,这是洋务运动初期大论战之后,已被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理念。然而,除黄遵宪、王韬等特出之士外,余人对于日本学习西方的制度变革,虽多所涉及,却往往持怀疑甚或批评的态度,如“前者果拙,而后者果工耶”(何如璋《使东述略》)、“当变亦变,不当变亦变”(傅云龙《游历日本余记》),他们的旅日感受,止于赞叹器物便利,事业盛大,制度层面则少有思谋,最终不免落入驻日公使汪凤藻感慨的窠臼:“今日之谈洋务者,仅可著书而已。坐言起行,戛戛其难。”(黄庆澄《东游日记》)

甲午之后,情形为之一变。从1894年中日战争开始,中国官绅阶层经历了甲午战败、庚子事变、日俄战争三次冲击,他们看待日本的眼光,也产生了急剧的变化。

甲午之败,举国震动,船坚炮利似乎犹胜东邻的北洋水师却在大连东沟折戟沉沙,洋务一派上自恭亲王,下至李鸿章、张之洞等,都不得不承认洋务运动未能达到预想的效果。当时中国各级官吏中,一批有志之士,一方面反对徐桐等人拒洋自守的锁国思路,另一方面,对洋务运动只重器物、不重制度的“西化”策略,也颇为怀疑。思想较为进步的各级官吏,则对康有为、梁启超为首的激进知识分子群体抱欣赏、支持的态度。

清末创办《京话日报》,推动北方启蒙运动的著名报人彭翼仲,其时官职是实授六品通判,记载当日社会情形是:“当强学会之盛也,举国若狂,群以得见康梁为至荣……迨四卿参预新政,朝旨奋发,雷厉风行,精神为之一振。设使阻力之生,则国家之进步安可限量?且庚子之乱,亦何由而起?”^①

^① 《彭翼仲五十年历史》,姜纬堂等编《维新志士 爱国报人彭翼仲》(大连:大连出版社,1996),第102页。

紧接着是庚子事变,对于官绅阶层的震动尤甚于甲午。当北京义和团最盛之时,彭翼仲曾因不肯在家设坛,被拳民夜掷火把焚烧凉棚。《扶桑十旬记》的作者杨芾,时任兵部主事,则因反对义和团,差点丢了性命:“编修杜本崇,检讨洪汝源,主事杨芾,皆指为教民,被伤几死。”^①

这些反对义和团运动的知识分子,在庚子之后,痛定思痛,对于中国的改革得失,有着比较彻底的反思。他们认为庚子之乱,发源是戊戌变法的失败,但庚子之乱的产生,并不完全是朝廷的失误所致,民众因缺乏教育导致的愚昧也是一大主因。民众,即便是义和团,总也是怀着爱国的情,希望中国强大而能抵御外侮的,何以酿成如此大祸?如彭翼仲所言,“固由当轴者昏聩无知,亦由人民无教育,不明所以爱国之道”,才会弄到“国几不国”^②。

庚子之后,朝野上下,要求立宪的呼声很高。尤其1904年日俄开战,一个新兴的立宪国家,居然打败了老牌的专制强国。明治维新以来,短短三十年,日本即从同被西方侵略的落后国家,一跃变为与西方列强相颉颃的先进国家,更让中国知识分子看到君主立宪与国民教育的好处。对于中国来说,日本是再好不过的一个模仿对象。19、20世纪之交,中国掀起了留日热潮,正是这种反思与效仿的心态所致。此种心态,有一位留日学生的呼吁可为代表:

日本与中国同逼于泰西,中国狃于自是,不肯师人,以购置器械为无上之政策,而日本游学者,皆汲汲研究其政法与其切实科学。德相俾士麻克有言曰:“日本其强,中国其弱乎!”今日本

① 罗惇融《庚子国变记》(上海:神州国光社,1947),第9页。

② 《彭翼仲五十年历史》,姜纬堂等编《维新志士 爱国报人彭翼仲》(大连:大连出版社,1996),第113页。

4 扶桑十旬记(外三种)

已列于强国,而老大帝国竟不能一洗甲午、庚子诸纪念之辱,而逗留于过渡时代之中者,则前鉴不远也。^①

留学、考察日本的人员众多,亦不乏“日本密迹,往者较繁”(张元济)的缘故,正如上文所称,长沙搭轮至日本东京,不过十五日,较之“往云南二三月,往陕甘二三月”而为方便,每年所费,“不过三百两银足矣”。

1905年,清廷派五大臣留洋,考察宪政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,回国后即转任两江总督。1907年春,杨芾接到端方咨文,赴日本考察。此时杨芾的职务是“记名军机章京、陆军部郎中”,与两江总督并无属辖关系,端方会请他赴日考察,应该与两人庚子前在京的交谊有关。

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廿四日(1907年4月6日),杨芾从上海出发,开始了他一百余日的东瀛之行。

二

杨芾,字若米,咸丰五年(1855)生于江苏高邮。三十三岁中举,次年(光绪十五年,1889)以殿试三甲二名,赐同进士出身。最后以山东莱州知府致仕。

杨芾是笔者的高祖,但族中谱系流散,他的生平也不是很清晰。清制,嘉庆、道光后,“朝考后授官,前列者用庶吉士,等第次者分别用为主事、中书、知县三项”(商衍鎏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》)。杨芾大概是中进士被授兵部主事,一直到1900年,他还担任此职。先叔祖杨汝栩在《我所知道的杨氏家族》里说杨芾“因才思敏捷、熟谙奏章,被调军机处任章京(又称小军机),是军机大臣的重要助手,主管缮写谕

^① 《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》,《游学译编》第六期,1903年5月。